

编者按:马克思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也是批判的理论。这种发展性和批判性不仅体现在马克思理论本身对于以往命题的创新性破解,也体现在其他学者对马克思理论的多重解读和尝试性批判与发展。马克思理论的生命力和真理性,在不断的批判与被批判中得到有力验证和无限延伸。

符号逻辑批判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更新与发展

王庆丰,蔡 垚

【摘要】鲍德里亚立足于消费社会的现实处境,指出当今社会的主导原则已经从物质生产过程转向了符码对人的操控;马克思基于“生产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无法解释消费社会的这种新变化。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拜物教,而消费社会中的拜物教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相统一的“符号拜物教”;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批判只是对生产内容进行批判,而应该对消费社会的生产形式——“符号逻辑”进行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策略也不再是指向剩余价值的剥削,而是符码的霸权,其解放途径是回到原始的象征交换体系。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的本质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那么鲍德里亚的资本主义批判所抓住的仅仅是资本逻辑的表象:符号逻辑批判。

【关键词】拜物教 生产逻辑 历史唯物主义 《资本论》

【收稿日期】2018-04-22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8)04-0036-07

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19世纪的《资本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如何走向当代,如何激活《资本论》的当代意义和时代价值,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鲍德里亚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别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的阐释和理解,鲍德里亚试图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在分析和反省马克思《资本论》的基础上,重新激活马克思的《资本论》。鲍德里亚立足于当今社会已经从生产为主导转变为消费为主导的社会背景,从对“物”的分析入手,对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整个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进行了重新阐释。因此,与其说鲍德里亚是对马克思《资本论》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不如说是对马克思《资本论》作了更新与发展。

鲍德里亚被誉为“后现代的学术思想精灵”,他捕捉到了现时代社会的本质性特征。鲍德里亚主张,在当今的消费社会中,我们不能再简单地沿袭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应该“直面符号政治经

济学批判”。“因为符号不只具有商品的内涵,也不只是交换价值的符号学补充。这是一个让自己进行结构操控的操作结构,与剩余价值的数量神秘化相比,它显得毫无恶意。符号的超意识形态以及能指的普遍可操作性——今天,它到处被结构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控制论等新学科所认可——已被作为这个体系的理论基础代替了旧的政治经济学。”^①因此,鲍德里亚主张走向与马克思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同的第二阶段: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鲍德里亚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更新与发展就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变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鲍德里亚揭示了消费社会中所产生的种种新变化,启示我们在现代性的语境中重新思考对抗资本统治的路径,寻求超越资本控制的道路。

^① [法]让·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107—108页,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一、符号拜物教

“拜物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重要理论范畴。马克思从商品入手,指出商品的神秘性质来源于商品形式。“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①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教”状态。在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生产社会转变为消费社会的指认的基础上,鲍德里亚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拜物教理论进行了反思。他认为,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虽然深刻地揭示了个人将资本统治加以内在化的现象,但从消费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拜物教理论是以商品、货币等概念为主要论述对象的,仍然局限在经济生活领域。如今资本逻辑对人的奴役和统治已经扩展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占领了我们全部的生活空间。与此相应,人们也将代表特权与差异的“符号/价值”当做新的崇拜对象,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没有触及的理论问题。虽然马克思思想通过拜物教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但在深层次上,这种拜物教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拜物教,它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

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始于“商品”,那么鲍德里亚则是从对“物”的分析入手,立足于消费社会的理论视角,来对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的。并且更进一步,鲍德里亚用“物”替代了马克思的“商品”概念,因为在他看来,在当今社会中,充斥其中的不再是“商品”,而是大量“物”的堆积。“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②这里的“物”不再是在生产领域中被生产出来的实体性商品,而是一种信息形式以及符号状态。因此,物的诞生并不在生产领域,恰恰在消费

领域,因为在消费社会中“物”成为“符号—物”,具有了一种“符号/价值”。如果在一个商品堆积的社会里,商品拜物教是透视这种社会现实的理论分析路径,那么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当中,其对社会的分析就转变成为一种“符号—物”的拜物教。鲍德里亚作出这种判断的理由是: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当中,使用价值作为商品所包含的满足人的具体需求的具体的有用性,是不受等价逻辑约束的。尽管使用价值在生产与交换过程中不断地被反复确认,但它仍然没有进入市场经济之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并不是那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共同体的商品的功能,而是一种交换价值的功能”^③。而在符码统治的逻辑下,“最初与我们打交道的其实是符号:一种被一般化了的符号的符码,一种完全任意的差异的符码,物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而不是由于其所具有的使用价值或者内在的‘特性’,才得以展现其自身迷人的魅力”^④。也就是说,当商品转变为一种“符号—物”的存在后,使用价值所包含的有用性、需要等属性也就消失殆尽了。

“拜物教”在鲍德里亚的意义上应该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共同的拜物教。鲍德里亚指出,正是因为使用价值是政治经济学的皇冠和王权,是最为隐秘的一处堡垒,连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没能触及,故而它本身成为一种最为隐秘的拜物教。“使用价值,即有用性自身,也可以被拜物教化为一种社会关系,就如同商品的抽象等同一样,使用价值也是一种抽象。”^⑤这就意味着,在消费社会当中,使用价值也被符码纳入自身并将其体系化了。所以,鲍德里亚在此是要将拜物教的理论批判延伸到使用价值的领域中去。一旦拜物教延伸到了使用价值的领域,那么“拜物教所揭示的并不是对于实体的迷恋,而是对于符码的迷恋,它控制了物与主体,使它们屈从于它的编排,将它们的存在抽象化”^⑥。也就是说,在消费社会中,拜物教不是将具体的、实体性的“物”神圣化,而是将物与物的关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9—9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页,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③④⑤⑥ [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70,105,170,105—106页,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所构筑的“符码”神圣化。在本质上说,拜物教并不与实体有关,而是陷入了一种体系、一种符码当中。

鲍德里亚不仅对于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的时效性提出了质疑,而且在更深层上,他认为马克思的拜物教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可以看做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附属物。“马克思用商品拜物教以及货币拜物教的概念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被神秘化了的、让人着迷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屈从模式,这种模式的形成是通过个体将一般的交换价值体系内化之后得到的。”^①鲍德里亚认为,自原始宗教以来的拜物教理论都意指着一种物化,在物化的背后包含着人的主体意志和人的本质,物化成了人的本质的假象,是一种“错误的意识”。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也是基于这种“错误的意识”,而这是一种理性形而上学的必然产物。这种形而上学将世界分离为诸如表象与本质、谬误与真理的二元对立,并最终偏向于其中一方。“通过将所有的‘拜物教’问题归结为某种‘错误意识’,即上层建筑的机制,马克思主义消除了拜物教能够分析真实的意识形态的劳动过程的任何可能性。”^②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仍然是在形式背后寻找内容,使人们最终认同并日渐屈从于交换价值体系。因此,它仍然还是停留在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之上,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意识形态的架构当中。

从出发点和目的上看,无论是马克思的“商品”还是鲍德里亚的“符号—物”,都是当今社会关系的一种显现。二者都可以看做是对社会现实本身的一种呈现,并通过这种呈现来批判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但不同的是,鲍德里亚比马克思更为激进。他认为,马克思指出拜物教的本质在于物与物的关系对人与人的关系的一种遮蔽,这就将现实分解成了物与物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二元对立,并凸显出人与人的关系更具有本真性,这就陷入了鲍德里亚所指认的那种西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当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尽管马克思揭开了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本质,却因为陷入了二元对立的结构分析模式,导致商品拜物教批判自身陷入了一种无法挣脱的意识形态。而鲍德里亚的主要目的是消解这种二元结构本身。由于符码已经作为一种霸权入侵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所以要想突破这种二元结构,就应该将从前被看做非意识形态的领域也纳入到意识形态的批判

当中。因为当下的社会陷入了符码结构的控制当中,“符号—物”突破商品的限制,将不能变成商品的东西全部变成了可交换的商品。在这种社会现实之下,一味地寻找那些未被符号化、形式化、抽象化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以符号为中介,传统的那种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了,因为它们都从属于符号学的分析原则,处于符码的霸权统治当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为拜物教批判理论加入了符号的维度。

总的来说,鲍德里亚是立足于现代消费社会的基本理论视角,从对物的存在状态的分析入手,揭示了“物”在消费社会中成了一种“符号—物”,将使用价值纳入拜物教批判的视域当中,为价值增添了“符号/价值”的维度。对使用价值拜物教的指认开启了一条对于当下社会现实有效的批判路径,它成为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在当代社会条件下的重新激活。

二、生产逻辑的乌托邦

如果说从使用价值拜物教的角度来看,鲍德里亚还只是基于消费社会的理论视角对马克思资本批判的逻辑的时效性提出质疑,想通过为拜物教理论增添一种符号批判的维度来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种补充的话,那么接下来,鲍德里亚则把反思的对象直接指向了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大厦的核心——生产概念。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在今天不能够洞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是因为马克思的这种批判还是建立在“生产逻辑”的基础之上的。正是这种“生产逻辑”隐秘地扩张了意识形态本身,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个意义上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谋,是一种在“生产逻辑”框架内的乌托邦。鲍德里亚对“生产逻辑”的批判始于对劳动与需要概念的反思,劳动与需要在消费社会中成了人的双重“类”面孔。鲍德里亚正是由使用价值批判引发对需要的反思,进而将批判延伸至劳动力,从而在根本上对生产逻辑进行批判。

如前所述,既然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当中使用价值也被符码体系化、差异化,成为一种拜物

^{①②} [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99,102页,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教,那么建立在使用价值基础上的需要概念也必然是值得怀疑的。他认为马克思将需要的概念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性预设,最终落入了意识形态的陷阱。究其根源,“需要”这个概念是在资本增值过程中产生的,在符码的差异性逻辑中已经成为确证社会再生产的手段。而资本为了实现自身的增殖,依靠大众传媒和广告等各种手段来积极地促进消费,诱导人们在消费中体验身份的等级和选择的自由。这种在媒介和广告的宣传下制造出来的需求实际上是与人内心的需求不一致的伪需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反问马克思“人真有需要吗?人能保证需要的满足吗?”^①鲍德里亚反对将需要的满足自然化的理论倾向。在他看来,需要的满足在消费社会中彰显的是一种体现身份与等级的社会区分功能。消费中的需要并不是人们真实的需要,它不过是对生产秩序的内在目的性的一种掩盖,是人们确证自己社会存在的手段。人们依据需要来寻找自己在体系中的位置。“我们相信‘消费’:我们相信一种真实的主体,被需求所驱动,将真实的物作为其需求获得满足的源泉。”^②而鲍德里亚却认为,消费中并不存在消费的主体,并不存在人们的基本需要,需要最终仍然是一种生产主义的界定。由此,“需要”不能再作为一种内在的、直觉的力量,一种自然的欲望来界定了,而是应该被视为一种资本主义体系自身的功能运演,即再生产的过程所必需的生产力。换言之,需要的存在只是因为体系本身要求它们存在。这种在“生产逻辑”的框架下建构的需要概念其实就是一种伪需求,资本家穿着需求的外衣,通过符码的体系化过程,使消费者获得对需求的内心认同,并将其看做本真性的欲望。其实这只是一只天真的人类学假设,“明明是伪造出来的他者欲望,却被重复建构成一种看似真实的我的本然的需要”。^③正是由于这种对人的需要和满足进行的合法包装,更深层的社会问题被遮蔽了。需要按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消费性的界定,是资本主义调整的内在策略。资本的意识形态在消费者的无意识之中将其纳入了符码的差异性体系,使之变成了一种抽象的有需要的躯壳。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成为生产秩序的一种掩盖。在“自然需要”的自由与民主的幻象下,真实运行的却是一套体现等级差异与权利体系的逻辑,“需要”这个概念仍然是生产逻辑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劳动二重性问题。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双重维度,与此相应,生产商品的劳动也有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两种形式。具体劳动生产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则创造了商品的价值。马克思曾指出,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④。但在消费社会的理论视域下,鲍德里亚则对这种劳动二重性的划分提出了质疑,并将其称为劳动的“质”与“量”的辩证法。在他看来,具体劳动是一种质性劳动,是不可比较的。而抽象劳动是一种量化的劳动,是可以比较的。这种二分最终导致了在社会生活当中能够产生价值的可比较的量化劳动被普遍化了。所以在劳动的“质”与“量”的二元分离当中,马克思最终凸显的仍然是劳动的交换价值的维度。更何况在如今我们所处的社会当中,劳动的这种辩证区分已经不再重要,任何劳动都降低为一种服务,它不再与生产相关,而是单纯在符码的体系中显示一种在场。同时鲍德里亚还指出,劳动在马克思那里还具有一种体现人类价值的维度,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的观念也被绝对化和自主化了。当马克思将劳动作为人的潜能来加以规定时,在深层上恰好确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今天的劳动不再能作为人的本质特征来加以界定,因为劳动的概念与其他陷入符码霸权体系的概念一样,都成为一种符码的抽象。劳动不再能够彰显某种特殊的价值,而仅仅是一种符码的社会参与的游戏。“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被界定于价值领域中,这就是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必须被当作意识形态概念经受激进批判的原因,生产、生产力的概念也是如此。”^⑤劳动依然作为生产逻辑的确证而存在,它不能作为革命的概念加以普遍化。鲍德里亚进一步指出,“将劳动力看作‘具体的’社会财富的来源,是对劳动力抽象操控的彻底表达:资本的真理在这种把人看作价值生产的‘根据’中达到了顶点。”^⑥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不只被当做生产者在劳动力上加以剥削,同时也通过需要的概念被建构为消费者来加以剥削。

①⑤⑥ [法]让·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2,25,5页,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7页,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③ 张一兵《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的学术祛序》,第95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5页。

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与需要是人的双重“类”面孔,而这正是生产逻辑作用的结果。正是生产的抽象和普遍化使得劳动和需要成为人的本质性规定。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需要与劳动概念进行了哲学批判,并进一步将这种批判升腾为一种更为重要的、系统的形而上学的思考。他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全部人类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一般物质生产基础。“对消费概念的激进反思要从需要与生产开始……正是生产的概念,需要进行根本的批判。”^①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生产概念是马克思资本批判的逻辑起点。但是在鲍德里亚看来,生产其实是马克思为阐发自己的革命理论想象出来的,“生产方式的批判理论没有触及生产原则,生产方式所描述的所有概念,也只是说明了生产内容的辩证的、历史的谱系,并未触及生产的形式”^②。也就是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对资本进行的批判看似深刻,实际上却没有上升到对生产原则和形式进行批判的高度。这种批判没有真正走出生产的逻辑,仍然是虚幻的“生产之镜”。这种虚幻的“生产之镜”究其本质是一种生产逻辑的乌托邦。“为了发现超越经济学价值的领域(实际上这是唯一的革命前景),就必须打破生产之镜,因为在这面镜中反映着整个西方形而上学。”^③而要真正打碎“生产之镜”,超越生产逻辑,就要对生产的形式进行批判,而不只是对于生产的内容进行说明。鲍德里亚眼中的生产的形式其实就是消费社会中一种特殊的运行机制,即符号的差异性编码过程。所以,他试图颠覆以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逻辑,代之以“符号/价值”为基础的符号逻辑。

三、历史的欧几里德几何学

鲍德里亚虽然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种种概念进行了质疑和批判,但从根本上来说,他并不是拒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从不否认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意义。“马克思用思想来触及社会现实,以完成他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有效批判。鲍德里亚同样以社会现实作为其思想的起点与最终旨归。”^④鲍德里亚认为真正应该进行反思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也就是以辩证法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的分析方法。

所以,在对拜物教理论和生产逻辑进行了基本的质疑和批判之后,他立足于消费社会中反抗和革命形势的新变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鲍德里亚认为,在如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符码已经通过无意识的作用,侵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对象不再是对劳动力的剥削,而是符号的霸权。整个社会的主导力量不再是生产的普遍性,而是符码对人的统治。正因如此,如今的反抗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今天的反抗“不再只是经济上的剥削问题,它很少指向剩余价值的掠夺,而是指向符码的强制问题,正是符码的强制形成了当下的社会支配策略。”^⑤从前的反抗直接针对的是经济上的剥削,而如今的反抗则直接指向符号对人的操控。由于在符码霸权下,生产时间的碎片化,被体系无标记地推向边缘的人们的反抗也越来越没有反抗的对象,因而他们的声音也就越来越不能被听到。由此,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仍然局限在生产领域,而如今我们更应该从一种“符号逻辑”的角度入手来对抗资本对人的奴役和统治。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对它的反抗和斗争也不能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样,单纯以“阶级斗争”来描绘。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将社会的主要矛盾抽象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并且试图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来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观点也是值得批判的。因为在如今以符码的霸权为主导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已经不能描绘革命反抗的全部内容。随着符码的逻辑对人的深入控制,传统意义上的革命的主体已经被消解掉了,阶级冲突只能被看做现代反抗的一部分。既然反抗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那么阶级斗争的革命观念也必然要加以扬弃。

鲍德里亚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上,是通过对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阶级的社会批判来说明无产阶级组织的。一方面,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和被组织了阶级,另一方面,存在着理性的和被结构了的

①②③⑤ [法]让·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3,1,29,121页,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④ 夏莹《拜物教的幽灵: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隐性逻辑》第13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理论(既有唯物主义的内容,同样也有辩证法的形式)——在这两者之间,每一个都根据另一个的形象将自己理性化,革命的辩证法短路了”^①。他认为用阶级反对阶级,仍然是生产方式辩证法的革命逻辑,它还是在生产的目的性、终极性的逻辑框架之中。如果阶级的概念有意义的话,并不是用一个阶级来反对另一个阶级,而是要使阶级走出阶级意识,不再从生产方式中界定自己,真正摆脱生产的逻辑。同时,在这种生产的辩证游戏中,革命也成了历史的终极目的,作为一种终极性真理成为了生产逻辑的一种确证。这一点在马克思著作的主题转换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在马克思早期著作那里,革命还具有乌托邦的意味,而到了《资本论》中,马克思则从革命的乌托邦转向了历史的辩证法,革命的共产主义被无限制地延期了。只有当现实需要人们革命时,人们才能改变现实。而在鲍德里亚看来,反抗不是指向未来,而是要立足于当下。真正的革命不应该是用阶级来反对阶级的局部革命,而应该是将世界看做受符码统治的未分离的世界,进行总体性的革命。

既然马克思的生产逻辑在鲍德里亚看来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谋,那么建立在物质生产理论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相应的也是意识形态扩张的表现。他认为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当成了适用于一切历史时代的普适性的科学。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历史的欧几里德几何学”,存在着不言自明的两个公理:一是,“历史的发展过程在所有早期社会就已经存在,但人们没有生产出这些概念,因此也就无法超越这些社会”;二是,“开始意识到这个过程的时候,也是革命的关键阶段”。^②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用以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是建基在这两个未经证明的公理之上的。马克思对这样一种前提性的预设理论却没有给出合法性的证明。于是,鲍德里亚宣称“所有这些都是彻底的黑格尔主义的观点。”^③同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对象化过程相类似,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历史过程也是遵循一定的目的而发展的,并以共产主义作为其终极目的。而鲍德里亚则认为,早期社会的人类从来不知道什么“历史的目的”,“他们既不是历史地生活,也不是在生产方式中生活”^④,“当我们用原始人并

不知道的概念和思维方式去图解他们的生活时,就发生了一场无意识中的理论暴力和观念强制”^⑤。既然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逻辑是虚幻的“生产之镜”,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则可以看成是想象的“历史之镜”。“只有在生产之镜和历史之镜中,在(生产)无限积累和(历史)辩证连续性的双重原则下,只有在符码的独断下,我们西方的文化才能在普遍性中认为自己处于真理或革命的特殊时刻。”^⑥在这两种虚幻的镜像中,商品经济的交换在生产逻辑的框架下不断更新和扩展,而人类的历史则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原则有目的地进行着建构。如果说需要与劳动是人的双重“类”面孔,那么“生产之镜”和“历史之镜”则是在符码控制之下的人类历史的双重虚幻逻辑。从根本上来看,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它的生成语境和核心概念仍然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想组织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仍然是意识形态”^⑦。因此必须打碎“生产之镜”和“历史之镜”,超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进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马克思那个以生产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转变为一个新的社会结构支配的存在。“这个转变涉及到从形式—商品到形式—符号,从一般等价规律下物质产品交换的抽象到符码规律下所有交换的操作的转变。与这个转变相对应,就是从政治经济学到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转变。”^⑧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向“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过渡,是因为消费的意义在本质上已经成为了一种符号的编码,我们处在符码的霸权之下。鲍德里亚立足于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变的时代背景,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拜物教理论的时效性提出质疑,进而将使用价值纳入拜物教批判理论中。在消费社会的视域中,通过对需要与劳动概念的重新阐释,揭示了生产逻辑作为意识形态的秘密,最终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鲍德里亚试图从马克思的生产逻辑中彻底摆脱出来,他尤

①②③④⑥⑦⑧ [法]让·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140、97、97、96、99、98、107页,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⑤ 张一兵《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的学术祛序》,第316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其强调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延伸物,二者之间不具有辩证的连续性。鲍德里亚社会批判理论的出发点不再是一个生产逻辑的社会,而是一个以符号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新的社会结构,是一个把消费建构为控制、把符号建构为操纵的社会。鲍德里亚对符号批判的指认,为我们解读消费社会,对抗资本逻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鲍德里亚最终指认的解放的路径和革命的方法是要回到原始的象征交换体系,彻底地逃离政治经济学的价值体系,逃离等价交换的价值原则。奈格里和哈特的革命政治筹划的解放途径是“出走”,鲍德里亚此处的回到象征交换的革命设想也具有这种“出走”的意味。实际上,单纯地宣称出走或是简单地逃离资本主义体系均不能真正超越资本逻辑的统治。鲍德里亚在激进批判之后,走向了逃离价值体系和生产逻辑的乌托邦。虽然鲍德里亚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核心概念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提出了一定的质疑,但是从目的和旨趣上看,他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衷是一致的。只是因为二者所处的资本主义的时代背景不同,选择了不同的批判方法。即使他自己宣称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断裂,并实现了根本的转变。实际上,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种转变并未涉及形式,而只是重心的转变。在这种意义上,他的批判逻辑仍然可以看做对马克思商品逻辑的延伸,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视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补充。

因此,鲍德里亚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反思与批判,只不过是新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下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更新与发展。实际上,马克思和鲍德里

亚都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深刻分析,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寻求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对于当下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把握,绝对不能像鲍德里亚那样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去寻求道路,而要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之内来寻求道路。鲍德里亚把现代社会指认为“消费社会”,这的确是抓住了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但也仅仅是现代社会的“时代性”特征,而绝非本质性特征。现代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被马克思《资本论》所揭示和发现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批判,这一批判的核心是“资本逻辑批判”。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与核心,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关系都是受资本逻辑支配的。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的本质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而鲍德里亚的资本主义批判所抓住的则仅仅是资本逻辑的现时代表象——符号逻辑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更具有本质性和穿透力。因此,人类解放的路径绝非是鲍德里亚所认为的退回到原始的象征交换体系,而是超越资本的逻辑。资本主义是我们生存的现实,革命绝对不可能是消极的全面逃离,更不可能是一种向原始的退回,而应是一种积极的超越。

(作者简介:王庆丰,河南林州人,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吉林省“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蔡垚,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于尚艳;责任校对:于尚艳】

ABSTRACT

On the Dynamics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by WANG Jun)

Abstrac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has attained remarkable historic achievements. To understand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we need to look for the impetus unleashed by the system reform.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China has sustain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by virtue of the formation of an open competition system in the ongoing market-oriented reform. This system includes the 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the competition among enterprises, and the tendency that the consistency of the two kinds of competition is greater than the centrifugal force. The formation of the open competition system began with the decentralization reform.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attempts, the decentralization reform since the 1980s has been advancing synchronously with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economic decentralization, 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which has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open competition system. The open competition system is also evolving with the changes of economic environment. To judge the changes of 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key is to find out the node where the original balance is broken and the new balance is rebuilt due to the change of either side with respect to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past 40 years, China's economic environment has undergone two significant nodal changes, which divide China's economic environment into three stages: seller's market stage, buyer's market stage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stag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pen competition system are different at different stages, as they change with the changes in stages.

Key words: economic reform; an open competition system; the 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the competition among enterprises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Resources Acquisition in the Context of Multiple Levels of Chinese Government——Triple Dimensions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and Government

(by DING Yi)

Abstract: The legitimacy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includes three parts, i.e. political legitimacy, legal legitimacy and administrative legitimacy. Starting from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Chinese government, we can get an insight into the triple dimension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and government. In the level of central government, political legitimacy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and central government has to govern the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in an ambiguous way based on the model of graduated control. In the level of intermediat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legitimacy is as important as legal legitimacy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and intermediate government has to adopt the fuzzy contract policy implementation model in the spher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innovate some institutions and put grassroots government in an effective incentive mechanism. In the level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 the issue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legal legitimacy is absorbed by the issue of administrative legitimacy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and grassroots government h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mbedded regu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and grassroots government. Generally speaking, if we put the 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to the analysis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we will get a novel approach to comprehe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and Chinese government.

Key word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legitimacy resources; central government; intermediate government; grassroots government

Free Market, or Government Domination? ——The Outlet of Charity Innovation in China

(by CHU Ying)

Abstract: In the West, charity innovation is activated by the market. Therefore, the charity innovation implies the value approved by the capital elites. When President Regan tried to promote the charity marketisation reform in the 1980s, this logic went up to the surface. After this reform, the charity in civil society kept going down, and then the social space so released was taken up by the charity capitalist. In this situation, the capital elites took the power from the civilians, and began to broadcast their neo-liberalism. The capital elites' charity innovation inclines to the market, while the civilians' charity innovation inclines to the society, which is attributed to the differences of value, status and action among different classes. Now, our local governments are trying to introduce the charity innovation which inherits the capital elites' characters. However, the question is, the capital elites taking the power of the society is not only contrary to the spirit put forward by Chairman Xi solving the tempor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our society, but also disadvantageous to keep the stability and harmony of our society. So, we shall research on the sinicization of charity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society, the most reasonable measure for us is government dominating in the process of charity innovation, through which the government can pass its love to the people and increase the happiness degree of the people.

Key words: charity innovation; marketisation; capital elites; public movement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Philanthropy under the Pressure System——Research Based on Community S in Guangzhou

(by ZENG Ling-fa, DENG Xiao-li, WEN Pei-xuan)

Abstract: Most researchers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hilanthropy from a nation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 as well as an interactive strategy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arity in this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ssure system, this paper studies why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has enough motiva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philanthropy.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under the pressure system, the government faces the pressure of rigid performance appraisal and the stress of human resource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so it is confronted with difficulties in social governance. However, community philanthropy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social governance led by urban grassroots government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is dilemma, thus the city grassroots government has enough pow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philanthropy.

Key words: pressure system; community philanthropy; resource constraints; social governance

Critique of Symbolic Logic: Baudrillard's Updat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s *Das Kapital*

(by WANG Qing-feng, CAI Yao)

Abstract: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Baudrillard points out that the dominant principle of today's society has changed from material production process to the control of codes on people, and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 criticism that based on "production logic" has been unable to explain this new change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Baudrillard thinks that Marx's commodity fetishism is only fetishism of exchange value, and fetishism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is the "symbolic fetishism" that unifies use value and exchange value. Marx's critique of production mode is only to criticize the content of production, but it should criticize the production form of the consumer society——"symbolic logic". The revolutionary strategy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no longer the exploitation of surplus value, but the hegemony of symbol. The way of liberation is going back to the original symbolic exchange system. The essence of Marx'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is the critique of capital logic, while Baudrillard'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only focuses on the superficial symbolic logic of capital logic.

Key words: fetishism; production logic;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as Kapital*